

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犹太身份叙事

——克拉拉·布鲁姆长篇小说《牛郎织女》评介

阳凌芝

内容提要 克拉拉·布鲁姆的德语长篇小说《牛郎织女》以自传式的情节架构，叙述了一位犹太流亡女作家与一位中国左翼戏剧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作品从犹太身份的视角再现了中国内战时期的社会场景。女主人公一方面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投射到中国共产主义者身上；另一方面，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异域不断建构与解构自己的身份直至消解。

关键词 克拉拉·布鲁姆 《牛郎织女》 犹太身份

《牛郎织女》（*Der Hirte und die Weberin*, 1951）^①是罗马尼亚犹太裔德语作家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 1904—1971）在民主德国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也是唯一一部记叙1947到1950年间处于内乱中的中国社会的德语小说。^②小说记述了身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女作家布鲁姆与中国左翼戏剧先驱、早期共产主义者朱穰丞^③间的故事。德国犹太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在致布鲁姆的信中写道：“通过一个犹太流亡者的眼光来看中国革命，这使得书中的描绘呈现出双重韵味。两个相爱的人，终其一生都在逃亡中虔诚地找寻对方，他们的故事是一首永铭于心的叙事诗。”^④他高度评价此书：“我想不出能与之媲美的第二部作品，今

① Klara Blum, *Der Hirte und die Weberin*, Rudolstadt: Greifen, 195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小说中文译本参见林笪《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Klara Blum）生平与作品选》，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Thomas Lange, “Emigration nach China: Wie aus Klara Blum Dshu Bailan wurde”, in *Exilforschung: Ein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Gedanken an Deutschland im Exil und andere Themen*, 3 (1985), S. 344.

③ 朱穰丞（1901—1943）于1930年加入“左联”。为摆脱国内白色恐怖，他打算前往苏联，但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去苏联的办法，他先去了法国留学，在法国曾与冼星海住在一起。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朱被驱逐出法国和比利时。1933年，他以德国一个马戏团的丑角身份终于进入莫斯科，后在国际革命戏剧同盟等组织机构工作。详见高年生《跨越时空的追寻》，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第7版。朱可常《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第78页。

④ Zitiert nach Adrian Hsia, “Das Leben als Ballade – Liebe, Schaffen und Tod Klara Blums”, in *China-Bilder in de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0, S. 161.

日中国的内部风貌在这部作品中展露无遗。”^①

布鲁姆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1904年出生在切诺维茨（Czernowitz）一个讲德语的富裕犹太家庭，与战后刻画“纳粹大屠杀”主题而声名鹊起的德语犹太诗人保尔·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是同乡。1934年，布鲁姆的诗作《屈服谣曲》（*Ballade vom Gehorsam*, 1933）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举办的一次文学比赛中获奖，她因此获得前往莫斯科学习的机会。二战期间，她作为红军宣传员奔赴前线，对德国士兵进行策反工作。^② 1937年底，她与朱穰丞相识，两人在一起仅短短四个月，朱突然失踪。为了寻找朱，二战结束后布鲁姆先后前往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维也纳、苏黎世和巴黎等地，1947年她辗转来到上海，生活在虹口犹太人居住区。同年秋，在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德国诗歌。1952至1957年间，她任教于南京大学。后来她移居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直至1971年逝世。她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朱白兰”，并于1954年获得中国国籍。^③ “朱”即借用其爱人“朱穰丞”的姓，“白兰”音同“勃（布）鲁姆”，又蕴含“洁白如兰”之意。^④

布鲁姆来到中国后，创作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个时期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香港之歌》（*Das Lied von Hongkong*, 1959）、诗歌集《遥远的路》（*Der weite Weg*, 1960）等。除了《牛郎织女》这部长篇小说之外，她还有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命运征服者》（*Schicksalsüberwinder*, 1961），遗稿现藏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和德国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布鲁姆还翻译过中国的诗词和民间故事，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Wang Gui und Li Xiangxiang*, 1954）。

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虽然已经开始了布鲁姆（朱白兰）研究，但对其德语自传体小说《牛郎织女》这部作品仍缺乏专门研究。^⑤ 这部极富现实色彩的德语小说，以犹太作家的视角，将内战时期的中国铺展在读者面前。当时的中国社会在作品中是如何被描摹的？作者构建出的中国图像有何含义？它与作家的犹太身份认同又有什么关联？本文将试图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① Lion Feuchtwanger, “Der Hirte und die Weberin”, in *Greifenalmanach*, 1958, S. 187.

② 高年生《跨越时空的追寻》。

③ Thomas Lange, “Exotische Wahlverwandschaften. Dshu Bailans jüdisches China”, in Wolfgang Kubin, *Mein Bild in deinem Auge. Exotismus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China im 20. Jahrhundert*,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5, S. 191.

④ 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⑤ 朱白兰研究的奠基之作作为杨志东（Yang Zhidong音译）的两部德文专著：即1996年出版的《克拉拉·布鲁姆——朱白兰（1904—1971），一位奥地利中国籍女作家的生平和作品》（*Klara Blum – Zhu Bailan (1904–1971). Leben und Werk einer österreichisch-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in* *Leben und Werk*, 1996），以及2001年出版的《克拉拉·布鲁姆：评注精选作品集》（*Klara Blum. Kommentierte Auswahl* *edition*, 2001）；2016年，林笏出版中文专著《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Klara Blum）生平与作品选》，填补了国内朱白兰研究的空缺。

一、“牛郎织女”——犹太女人的乱世爱情

小说第一章《上海的梦想者》中，作者对张牛郎进行了翔实的描写：“他高高瘦瘦，一张精致的脸上有着细长的眼睛，他嘴边显出一种神情，仿佛在追寻着什么，带着温和的顽强。”（Hirte：8）张牛郎出身于上海富商家庭，但他不愿遵父意从商。相反，他常协助农民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与资本家作斗争；他与好友开办夜校，帮助农民朋友读书识字、接受教育，在此期间，他与他的学生、农民出身的王朴诚结下了深厚情谊；他还创办了“梅花剧社”：“梅花是一年之中开得最早的花，迎着严寒与风暴绽放，它于中国人民是革命的象征。他的剧院也是如此，在半殖民的屈辱以及半封建的恐怖镇压中发展起来。”（Hirte：72）实际上，张牛郎就是朱穰丞的化身，小说中的“梅花剧社”即暗指朱穰丞与袁牧之等人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于上海创办的辛酉剧社。“梅花剧社”经常上演同时代的人民戏剧，如田汉的《咖啡店一夜》《获虎之夜》（Hirte：47）、曹禺的《雷雨》、契诃夫《万尼亚舅舅》（Hirte：43）等。从上演的这些剧目来看，张牛郎不仅是“新剧”理念的践行者，同时也是剧社反封建与先锋性的纲领的践行者。“岛国鬼子”（Hirte：43）不断对我国发动袭击，在紧张的局势下，张牛郎等有志之士有意排演一出捍卫民族独立的剧目，但由于蒋介石集团对抗日宣传的高压控制，他们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为了革命理想，张牛郎决定去莫斯科。

女主人公汉娜在小说第二章《幸福的碎片》（“Ein Splitter Glück”）中出场。她是一位在苏联活动的犹太女作家，与张牛郎偶然相识于国际工人救济会。他们的对话始于对各自民族语言的介绍，汉娜以犹太民族有两种语言为傲，一种是意第绪语，另一种是圣经的语言——希伯来语。牛郎回应她：“我们的民族也是这样，儒士的语言——文言文，和大众的语言——白话。”（Hirte：67）这可能是布鲁姆对中文语言认知的一个误解，但显然是汉娜与张牛郎寻求共同点、相互吸引的开始。与朱穰丞相识后，布鲁姆在1938年写下的《民族之歌》（*Das nationale Lied*, 1938）便是对两个民族的共同命运深表关切的最好写照。^①文学、民族、革命——太多的共同志趣，二人的命运交汇了。然而，在四个月后的一天，汉娜接到牛郎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却极其沙哑，”他说，“我今天不能来了，汉娜”，“我想给你打电话，我想再次给你打电话……他的声音突然沉默。电话那边一片沉寂，冰冷无力的恐惧感缓缓

^① Yang Zhidong, *Klara Blum. Kommentierte Auswahl edition*, Wien u.a.: Böhlau, 2001, S. 30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爬上她的皮肤”（*Hirte*: 101）。这段细节描写重现了1938年4月15日，朱向布鲁姆打电话告别的场景。

第三章《牛郎织女星的日记》（“Zwei Sternbilder für hren Tagebücher”）的叙事视角转为第一人称，作者通过书信的形式讲述了张牛郎在巴黎、莫斯科、越南、延安、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汉娜认为张牛郎因执行某项秘密工作，不便再与她相见，因此在给牛郎的信中多次表达自己矢志不渝：“我将忠诚于你，即使经过五年的分离，经过十年的分离，哪怕所有的聪明人都在嘲讽我：‘这是怎样的自欺欺人！这是怎样的幻想！’幻想？——我要把幻想变为现实。”（*Hirte*: 127）实际上，为寻找朱穰丞，布鲁姆在1948年亲自去了朱在上海的家，见到了朱的夫人王季凤。布鲁姆称自己与朱在莫斯科已结婚，王错愕万分，于是拿出朱的一张照片给她辨认。布鲁姆激动不已，说她要找的正是这个人，甚至请求王把照片赠与她（*Klara*: 18）。“我这么坚定地自称为你的妻子，这本是一种犹太人的厚颜无耻。实际上，用地道的维也纳话来讲，我和你只是有了一点男女关系。——但你就是我的丈夫！”（*Hirte*: 168）直到死，布鲁姆都没有放弃等待朱穰丞的归来。她不知道的是，朱于1938年4月15日——也就是向她告别的那天——被哈萨克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1939年6月以“间谍罪”被判处在劳改营监禁八年。1943年1月17日，他在服刑期间死于西伯利亚的劳改营。^①

二、“中国人的妻子？”——犹太流亡者的身份认同问题

当汉娜踏上寻找爱人的路途时，她也开始了寻求身份认同之旅。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负面人物——她的上司墨提尼，一名奥地利共产党员，但汉娜认为他是“伪共产主义者”。他曾宣称，消除反犹主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没有犹太人！墨提尼还常对汉娜出言不逊，骂她是“歇斯底里的贱货”（*Hirte*: 131）。在张牛郎不见踪影后，汉娜忧心忡忡地去找张的好友、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韩秋宝^②帮忙。她在走廊上不巧遇到死对头墨提尼，看到他老奸巨猾的脸上满是嘲讽：“那只‘黄鸟’^③飞走啦？现在谁还有兴趣为你出头？”汉娜表情愠怒，心里狠狠咒骂：“畜生！封建主！反犹

① 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第234页。

② 其原型人物很可能是中国现代诗人萧三，萧三是湖南湘乡人，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同时也与朱穰丞相熟，与小说人物特征相符。详见Yang Zhidong, *Klara Blum. Kommentierte Auswahl edition*, S. 244.

③ 鸟，德语为“der Vogel”，另有“怪人”的意思，带贬义。

主义者！”（*Hirte*: 103）布鲁姆对墨提尼的刻画引起了当时东德文学出版事务局的不满，他们认为此人很大程度上影射了恩斯特·菲舍尔（Ernst Fischer, 1899—1972）（*Klara*: 598）。《牛郎织女》在问世的第三天就被勒令撤回，布鲁姆认为这与菲舍尔脱不了干系。她向时任东德总统的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 1876—1960）求助，但由于费舍尔当时在奥地利共产党中身据要职，并且在整个东德都拥有极大影响力，该书在发行之后不得不一直归于沉寂（*Klara*: 600）。

汉娜的身份也被同胞们所拒斥。“为了一个三年毫无音讯的男人，我像尼姑一样生活，移民圈的人们指责我，觉得这是病态的亢奋。”（*Hirte*: 131）邻居贝格曼夫人对汉娜的谩骂将她的身份认同推入更具冲突性的困境。贝格曼夫妇来自德国中部城市，无业，靠收房租在德国过上了有钱的日子。希特勒政府上台后，因其“劣等民族”的身份，贝格曼夫妇的财产被没收，并且还被迫更名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犹太人祖先的名字。他们连自己的命名权都已失去，而命名意味着身份。尽管同属犹太血统，他们却尤为鄙视东欧来的犹太人。在家乡德国遭受纳粹的欺压后，仗着白种人的身份，他们来到上海欺负“更低等”的本土中国人，这无疑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宣泄、报复的扭曲快感。每每此时，汉娜就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中国人：“我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妻子。”（*Hirte*: 185）贝格曼夫人则破口大骂：“她是个不要脸的波兰人，她把中国人的污秽带回家里。只有性欲过剩的母猪才愿意跟一个中国人上床。”（*Hirte*: 192）上海越来越多的场所不让中国人入内，傲慢的外国人横行于街上，仿佛他们才是主人，当地的乞丐和黄包车夫被毫无尊严地驱赶，四处流窜。作为活在忘我世界中的“后天中国人”，汉娜扮演着一位革命的“人民妻子”角色。^①看到“自己”的家园被外国人占据，看到“自己”所关爱的人民受苦，汉娜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力，她似乎把自己活成了张牛郎，但却没有去为自己身份“斗争”的资格和能力。

内战后期，汉娜决定去北平寻找张牛郎。她带着两封推荐信上了路：一封是牛郎的婚配妻子唐美音写的文言文书信，让汉娜去投靠在京城背景雄厚的母亲；另一封来自牛郎的好友傅楷盟、李鸣凤和赵永祥，是一封言简意赅的白话文书信，他们让汉娜找马叔平接济。马曾是他们剧社的一员，现是一名中共干部。美音母亲的大宅里陈列着一些来自紫禁城里的宝物，可见其家世之显赫。初见夫人，汉娜向她鞠躬行礼，但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回应了一下，说明这位贵夫人并不待见这个外国女人。在她心目

^① 夏瑞春《永远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鲁姆和她的中国遗作》，收入印芝虹、叶隽等主编《中德文化对话》（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

中，对待下等人，根本用不上风雅的儒家礼仪。夫人以家中客人已满为由，将汉娜拒之门外。于是汉娜也开始否定自己的身份：“中国需要的是斯大林的友谊，而不是我这种忍饥挨饿的外国流浪汉的友谊。”（*Hirte*: 242）同唐家夫人一样，马叔平也没有接纳眼前这位“乞讨的白鬼”（*Hirte*: 267）。他说，人人都知道张牛郎死了，他没有义务接待汉娜，并且谁能保证她不是一位“间谍”呢。外事警察局冯上校来登记汉娜的情况，冯说按照规定本该逮捕她，但现在则把她当作客人，因为“您选择了一个黄种人作丈夫，那么忠贞不二，您是白人，特权人种的女儿”（*Hirte*: 252）。此时，汉娜为她的“白人”身份感到遗憾，因为她知道“特权人种”对中国百姓意味着什么。汉娜来到中国千里寻夫，没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却四处碰壁。

作为流亡的犹太人，汉娜以“中国人的妻子”自居，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仅仅只是陷入“双重身份”困境^①，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身份认同的困境。汉娜早已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民的一份子，她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她不是欺压百姓的“特权人种”；她的“丈夫”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她追随他的脚步，亦不是背叛中国革命的外国“间谍”。但她又拿什么来证明呢？她终究是个外国人，尤其当时社会动荡，国内政治斗争风云诡谲，外国势力虎视眈眈，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她回击不了别人对她身份的质疑，她的身份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不断被建构，又不断被消解。她成了一个没有身份归属的人——她既没有被犹太同胞认同，也没有被中国百姓承认，即使她表现出自我牺牲式的对中国的同情与热望。

三、“北平和平解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理想

小说再现了国共内战的历史风云：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韩秋宝在与张牛郎的对话中表示，有些活动必须秘密进行，以防那个“老骗子”故技重施，像1927年那样再次“背叛”革命（*Hirte*: 87）。张牛郎在写给汉娜的日记中称，蒋介石厌恶共产党，“红军”更名为“八路军”是蒋为了粉饰太平做的表面功夫（*Hirte*: 112）。信中，张牛郎提到了1941年“国军围剿新四军”事件，认为这件事很可能是蒋的刽子手所为（*Hirte*: 122）。他的日记还记录了抗战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国内政治”（*Hirte*: 120）以及“马寅初因评论经济崩溃原因，得罪国民党而被关押”（*Hirte*: 127）等社会事件和现实。作者借牛郎之口指责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的无赖态

^① Thomas Lange, "China als Metapher. Versuch über das Chinabild des deutschen Romans im 20. Jahrhundert", in *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 3 (1986), S. 346.

度，美国统治阶级“宁要反共的泥潭，不要共产主义的耕地”（Hirte：145），而“国民党只是一家美国的贸易公司”（Hirte：217）。重庆谈判失败后，牛郎在1945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亚洲战场上，日军战败，但军事斗争并未停止。因为蒋介石没有给我们别的选择：屈服或者开战。他们军队的优势是美国的武器，我们的优势是对人民群众不变的态度。那我们就，开战。”（Hirte：148）作者对国民党的态度直言不讳——后来上海的三个大学生因进行“颠覆活动”被判死刑，宣判之时他们高喊：“我们判处国民党死刑！”（Hirte：221）

汉娜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这边，小说的标题便隐含了她对阶级身份认同的思考。牛郎织女的传说不仅象征着她的爱情，同时也是她政治立场的表达——“牛郎”代表农民阶级，“织女”代表工人阶级。小说中的平民女性大都是“女织工”的角色，每逢乞巧节，她们便拜会天上的织女星，“织女会保佑我们，织女和我们一样是劳动人民”（Hirte：223）。作者还塑造了一个结合“农民”与“工人”身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王朴诚，他出身农民，曾经是一名苦力，经过不懈努力成长为交通运输部部长。他的演讲极具号召力：“同志们！……在漫长的道路和弯路上，我们必须将我们国家僵化的那部分唤醒，使它活起来。我们要用我们的认真、艰苦修筑的铁路，用准点和连续运行的火车，将皇帝、官吏、军阀、资本家阻止的东西追回来，那便是：中国的粮食供给、中国的建设、中国的启蒙。”^①这段描述显示出作者对工人阶级智慧和力量的高度赞扬，寄望工人阶级肩负起对新中国的未来的责任和使命。

汉娜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她听到广播中林彪与傅作义之间的和平对话。她始终相信牛郎还活着——汉娜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是由布鲁姆弥赛亚性的世界观决定的——“尽管当下身陷囹圄，但仍坚定对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②汉娜为自己造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梦：在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她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理想世界，它在劳动者的意志中颤动……在中国人的微笑中冉冉升起，这是一个美丽的、和平的、公正的大地，它不是由上帝创造的，它是由人开始创造的”^③。汉娜既是“以色列的女儿”（Hirte：121），同时也扮演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无私奉献的妻子的角色，书写政治”^④。她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投射到中国共产主义者

① 林笈《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Klara Blum）生平与作品选》，第286页。

② Yu Yang, “‘Ich bin zuhaus in Ost und West in jeder Jugendgasse.’ Zum politischen, zwischengeschlechtlichen und künstler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von Klara Blum (Zhu Bailan)”, in *Literaturstraße: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Spra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7, S. 198.

③ 林笈《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Klara Blum）生平与作品选》，第285页。

④ 夏瑞春《永远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鲁姆和她的中国遗作》，第260页。

的身上，在经历了苦难与战争之后，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无疑等同于犹太民族“弥赛亚的降临”^①，这对于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更是在灵性上的救赎和治愈。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汉娜心目中政治理想的投影，是她自以为实现了的关于乌托邦的幻想，她信以为真，激动不已。小说以“牛郎织女”的传说首尾呼应，汉娜最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与牛郎短暂相逢，即日他们又将分离。这部小说中所书写的中国是从叙述者意识形态中主动生成的权力话语，这是她心甘情愿的选择，这里的“中国”承载了她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当然这也是张牛郎为之牺牲、为之奉献的绝对信仰。尽管她在中国社会不断陷入被排斥的境地，尽管她与中国建立的更多的是一种单向的认同关系，尽管她甚至没有能力展开去争取被承认的“斗争”，但这不影响她带着坚定而美好的幻想在没有张牛郎的世界里坚持下去，因为她自己就是某个意义上的“张牛郎”。

结 语

《牛郎织女》这部德语小说以中国内战为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们通过一位犹太作家的眼睛，看到了内战时期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不仅有中国人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中国人与外国殖民者的矛盾，还有国内社会本身存在的阶级矛盾以及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等。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处在这个矛盾社会中的犹太女人，汉娜是一个“边缘人物”，她到底归属何处？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她来中国寻找爱人的过程，亦是她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通过她的叙事，我们发现她的身份处在不断的建构与解构的动态变化之中，她的身份在内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中最终趋于消解，用“陌生者”来称呼她，也许合适，但又恐怕还不够。

*本文为北京市一般社科项目“德语文学中的北京形象研究”（15WYB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余静远

① Thomas Lange, “Exotische Wahlverwandtschaften. Dshu Bailans j ü disches China”, S. 194.